

北魏孝文帝朝的改革

何德章

冯氏被尊为皇太后,时年 24 岁。作为汉族女性,冯氏更喜欢中原文化,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感,她“粗学书计”,并非天生的改革者,但她长期以“女主”执政,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,使改革既有必要,也有可能。太和十四年(490)冯太后去世,人亡而政不息。孝文帝正式成为改革的主导者,时年 23 岁。孝文帝是冯氏改革的参与者与推进者,也是冯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。

应邀就北魏孝文帝改革做一笔谈,初觉轻松,真写起来却颇感难以着笔。孝文帝改革是各种层次的教材必然会讲述到的历史内容,要谈出新意,殊为难事。思之再三,本文拟结合个人以往研究心得,对孝文帝一朝改革的发展过程,做一些梳理,谈一些教材较少涉及的史事,间或提出自己可能还不太成熟的想法,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不予过多地涉及。希望能对读者诸君全面了解孝文帝改革有所帮助。

文题以“孝文帝朝改革”为名,而不是“孝文帝改革”,是因为孝文帝一朝前后改革

的主持人、改革的背景、改革的目标,都有很大的差异,简单地称之孝文帝改革,有违历史真相。

北魏孝文朝的改革,既是北魏创立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,也是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。

公元 467 年八月,孝文帝拓跋宏诞生于平城。其父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当时虚岁 14 岁,其母姓李,为中原汉人,大概已有 20 多岁。两年后,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,却给她的生母李氏带来了杀身之祸。北魏创立者拓跋珪为了避免太子

母亲的家族干预朝政,定下过规矩:皇位继承人选一旦确定,则处死其生母,当时称之为“子贵母死”。

皇太后冯氏亲自担负起抚养孝文帝的责任。冯氏并不是孝文帝血缘意义上的祖母。孝文帝的亲祖母与其生母同姓,也因“子贵母死”制度被处死。冯氏也是中原人,祖籍长乐信都(今河北冀州市),她的祖先任职于鲜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权。冯氏的祖父冯跋夺得政权,成为十六国北燕政权的皇帝。北燕被北魏消灭后,冯氏人物有的逃亡,有的出仕北魏。冯氏幼小时因故以罪犯家

属的身份充入后宫为奴婢。冯氏的姑姑在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的后宫中颇有地位,对她加以提携、教育,15 岁时,冯氏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。《魏书》中有关于冯氏与文成帝感情深厚的描述,但记载并没有显示她曾经生育儿女。

465 年,文成帝 26 岁时去世,12 岁的皇太子拓跋弘继位,冯氏被尊为皇太后,时年 24 岁。鲜卑贵族、车骑大将军乙浑假传圣旨,诛杀朝臣,自封为丞相,图谋篡权。次年二月,冯氏“密定大策,诛浑,遂临朝听政”(卷 13《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传》)。这是冯氏第一次

执掌朝政。显然,冯氏能够扭转乾坤,是因为她身为后宫之主多年,在宫中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,在朝廷中也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。冯氏此次执掌大政的一二年中,有两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举措。

其一,推广儒学教育,在各郡设置博士、助教,根据各郡大小,招收学生 40—80 人。地方政府按朝廷规定,全面兴办学校,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,对于北魏这个当时仍以鲜卑武人为主体的政权来说,更是难能可贵。其二,利用南朝

(下转 9 版) 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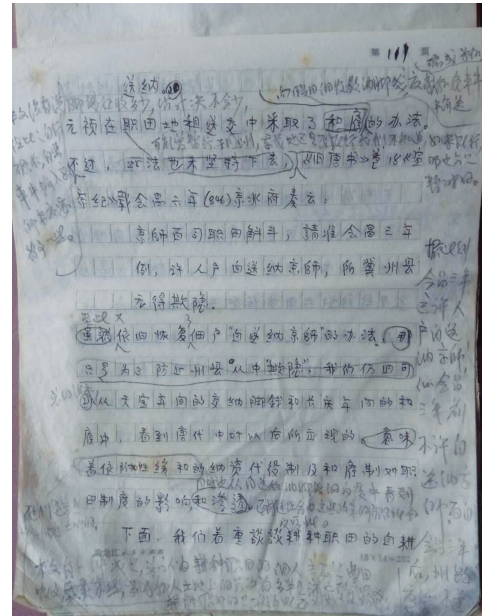
← (上接 7 版)

还有一则饶有趣味的事例,唐先生曾对陈国灿抱怨:“有人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,请问我实证是为了什么?”

1981 年,唐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。1982 年,他招了 2 名硕士研究生,孙晓林和孙继民。1983 年,招收硕士研究生冻国栋。

孙晓林说,唐先生授课风格与他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一致。唐先生讲课不是拿着旧讲稿照本宣科,而是着重讲他最新的研究专题。给上一届学生讲过或者已经写成文章发表过的内容,绝不再重复讲。孙晓林至今记得,在她的本科毕业论文“唐代西州水利灌溉系统”上,唐先生在审稿时把前几页都划掉了,批了“唯陈言之务去”几个字。

1984 年,唐先生招收了第一名博士研究生牟发松。1986 年,吐鲁番文书整理及定稿工作告一段落,唐先生回到学校继续从事原有的科研和教学,冻国栋开始兼任他的学术助手。那时唐先生的眼疾很重,冻国栋除了协助他查阅资料、誊写文章、处理信件外,还给他读报纸、杂志。他记得唐先生每天必看《新闻联播》,报纸常读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的理论版以及《参考消息》。每期《历史研究》寄来后,冻国栋就先给他念所有的标题和作者,他若感兴



唐长孺先生 1981 年审阅学生毕业论文(初稿)的批语 李文澜供图

趣再读全文。

1987 年,唐先生指导在职博士生冻国栋。就在那年,唐先生开设了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”课。听讲者除了他和牟发松之外,校内外部分教师,如陈仲安、陈国灿、朱雷、李文澜等都参加。“这门课程的讲稿,就是唐先生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》(下简称《三论》)一书的雏形。”

王素说,唐先生一生深受 3 位学者影响:陈寅恪,主要在方法论方面,当然也包括理论,甚至包括文化史观;吕思勉,主要是熟悉通史,掌握和驾驭史料的能力,包括实证;李剑农,读了很多书,包括反复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。此前也发表了不少为史学界、宗教界称道的道教、

年 3 月出版的《三论》可以说是这些学术影响的集中体现。在书中,唐先生从“客”这个劳动生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,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,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亚洲型封建社会”概念。

冻国栋记得,这部书原本叫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》,唐先生考虑到“没有通盘,不能叫概论”,最后将书名改为“三论”。在《三论》出版前,唐先生删去了文中原有的数万字有关佛、道二教的研究内容。“他谦称这部分自己的修养不够,不宜放进去。”冻国栋说,唐先生料的能力,包括实证;李剑农,读了很多书,包括反复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。此前也发表了不少为史学界、宗教界称道的道教、

太平教、天师教和佛教弥勒信仰相关的论文。而且,冻国栋在整理唐先生年谱的时候,发现唐先生早在 1951 年就已经在研读佛教、道藏资料了。

冻国栋出国访学后,何德章从 1992 年 9 月起至 1994 年 10 月唐先生过世期间,担任其学术助手。何德章说,唐先生晚年身体状况不佳,3 位至亲好友的过世更是给他以巨大打击:1986 年 6 月,挚友王仲莘教授逝世;1990 年,夫人王毓瑾病逝;1993 年,挚友、邻居吴于廑教授脑溢血过世。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,唐先生还在不断地进行学术思考,甚至撰写论文,即使在确知身患癌症之后,唐先生也要求他每天为自己诵读魏晋隋唐方面的新文

章。1993 年上半年,唐先生让何德章通读了马克垚先生的新作《英国封建社会研究》,应当是希望借以加深对“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变化与发展”这一问题的理解。1993 年年底,唐先生还在《武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发表了长达 2 万字的《论南朝文学的北传》,从汉代传统述及宋代文风。1994 年夏天,唐先生仍打算完成一篇论文:通过陆云与其兄陆机之间的来往信件,探讨二陆进入洛阳后受北方玄学影响产生的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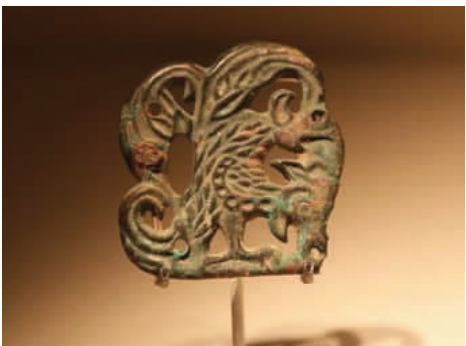
学旨趣变化。第一部分逐一讨论这批来往信件写成的具体时间、地点,三易其稿,在过世前一个月基本定稿。

“唐先生是个特别通达的人。”何德章说,唐先生的晚年除了继续学术研究,也会和大家聊些学林掌故。他印象最深的,是唐先生品评过颇多人事,“但对研究所里两位年轻同事,他始终未曾言及,说希望我们三人将来能团结,一起努力工作”。

唐刚卯告诉记者,1994 年 9 月,父亲病情恶化入院。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,每天都有学生前来值班,轮流照顾,武汉大学和相关医院也多次研讨抢救方案。在父亲最后的时刻,床前围满了学生。10 月 14 日,唐先生病逝于武昌梨园医院。他早前已自撰墓志铭,并请启功先生书写:“生于吴,没于楚。勤著述,终无补。宜家室,同甘苦。死则同穴夫与妇。”

陈国灿说,墓志铭是唐先生此生自愿公开的最后文字。先生离世前一两个月时曾对他说:“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,该出的书都出完了,以后不要以我的名义出版我的文章。”

对此,冻国栋表示,唐先生辞世后仍有他的“文存”和“文集”出版,可能违背了先师意愿。“在是否要出书问题上,唐门弟子意见不统一。”他感到,在他们整理发表的一部分唐先生的札记及讲义等未刊稿,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旧作里,有些是唐先生认为还不成熟、需要大改的,“先生生前是不可能同意发表或结集出版的,现在回想真有些对不住他”。 ■



左为陶马,北朝明器,河北省景县封氏墓群出土。北朝军队中有大量骑兵。从北魏政权开始,就十分注重马匹的获取,主要从征伐北方草原部落的战争中得到。右为鸟纹青铜牌饰,北魏早期制品,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。东汉初年开始,由于匈奴衰落,原本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、草原交错地带的拓跋鲜卑逐渐迁移至内蒙古草原阴山以南,并深受当地草原文化的影响。动物纹牌饰便是具有典型草原文化特征的装饰品。

← (上接 8 版)

刘宋政权的内争,遣慕容白曜率军夺取青、齐,进占今山东半岛。自拓跋焘于 439 年统一北方以来,北魏虽然一直对南方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,但在黄河以南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。夺取青、齐二州,使北魏将南方的防线从黄河一线推进到淮河流域,洛阳一带不再有腹背受敌之虞,这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,南向发展,创造了条件。

《魏书·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传》说:“及高祖生,太后躬亲抚养。是后罢令,不听政事。”高祖是孝文帝的庙号。一些学者将这一记载理解为冯太后为了亲自养育孝文帝,遂不再过问朝政,进而怀疑孝文帝是冯氏的私生子,冯氏放弃权力,很可能是因为分嫡而有不便。但按《魏书》记载,冯太后与孝文帝之间关系曾一度相当紧张,冯氏曾经打算废黜他,要说冯氏与孝文帝是母子关系,根据确实不足。持此说者以今度古,认为孝文帝出生时,献文帝虚岁 14,孝文帝不太可能是其亲生。但无论从当时习俗还是生理角度看,都不成问题。草原习俗,男子能骑马弯弓,即视为战士。受此影响,北魏均田令规定男子年 15 岁便可占有田产,北周时法令规定,男子 15 岁、女子 13 岁必须结婚,更早结婚自然不在禁止之列。据《魏书》卷 22《元恂传》,孝文帝在长子元恂只有十三四岁时,便纳名门之女为元恂左右孺子,而且希望元恂“食后还内,哺时复出”,不要废日没夜地读书。孝文帝本意当然还是希望尽快有个孙子,崔光等人却以孔子“血气

未定,戒之在色”一语劝阻,反对元恂“舍书御内”。这也说明,当时鲜卑族男子十三四岁过两性生活为正常行为。献文帝虚岁 14 时,与正当盛年的李氏生下孝文帝,并非不可能之事。其实,献文帝出生时,其父文成帝也只有 14 岁。

冯太后第一次执政,“是后罢令”。“是后”究在何时,《魏书》并无明确交待。如果生育之说不可信,则冯氏放弃对朝政的掌控,应该是献文帝逐渐长成,在拥护自己的朝臣支持下,不断逼迫的结果。冯氏正当盛年,喜欢上“美容貌,有才艺”的都官尚书赵郡人李弈,这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李氏兄弟及亲属依仗冯太后对李弈的宠爱,“关乱公私”,引起献文帝的强烈不满(《魏书》卷 36《李顺传附李数传》)。皇兴四年(470)冬,献文帝将他们诛杀。此事反映出冯氏与献文帝之间的激烈矛盾。

次年八月,年仅 17 岁的献文帝突然将皇位传给年仅 5 岁的皇太子拓跋宏,以“太上皇帝”的身份自处。北魏历史进入孝文帝朝。

关于献文帝退位的原由,《魏书》卷 6《显祖纪》称因其“雅薄时务,常有遗世之心”;退位之后,“徙御崇光宫,采椽不斫,土阶而已。国之大事咸以闻”。似乎真的过上了不同世事的隐居生活,唐朝人怀疑献文帝是在皇太后冯氏的逼迫下退位的,后人遂据以为信史,但献文帝内禅于其子,完全有可能是为进一步削弱冯氏权力而做出的努力。从《魏书》的记录可知,退位后的献文帝,既没有放弃,也没有丧失实际的权力。“太上皇帝”仍然掌握着“万机大政”,还曾两次统率大军前往漠北,征讨柔

然,其宠臣李忻“参决军国大议,兼典选举,权倾内外,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”(《魏书》卷 46《李忻传》)。献文帝年纪轻轻便传位于皇太子,自然有助于巩固孝文帝的地位,而他以“太上皇帝”自居,冯氏皇太后的身份便显得极为尴尬。从孝文帝继位到“太上皇帝”拓跋弘去世五六年间,我们在《魏书》中确实也找不到关于冯氏活动的记录。献文诛杀冯氏宠幸的李弈等因李忻告发,李忻因此而受宠于献文,冯氏对李忻自然会切齿痛恨,但直到献文帝“暴崩”之后,冯氏再次执政之太和元年(477)才将李弈,这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李氏兄弟及亲属依仗冯太后对李弈的宠爱,“关乱公私”,引起献文帝的强烈不满(《魏书》卷 36《李顺传附李数传》)。皇兴四年(470)冬,献文帝将他们诛杀。此事反映出冯氏与献文帝之间的激烈矛盾。

承明元年(476)六月,“太上皇帝”拓跋弘去世,今本《魏书》沿自北魏国史,对于献文帝死因,讳莫如深。唐朝人揣度献文帝之死为“暴崩”,是冯氏行“酖毒”所致。《魏书》卷 7 上《孝文帝纪上》当月两条记录倒是颇值得注意:“六月甲子,诏中外戒严,分京师见兵为三等,第一军出,遣第一兵,二等兵亦如之。辛未,太上皇帝崩。”两条记录,既可视作单独记事,也可视为相互联系的事件。

平城内外突然戒严,显然是有大事发生。京城内现有军队被分为三个等级,或许是按精锐程度。迅速派出精锐,第二批军队络绎派出,显出事态严重。“京城见军”是由谁控制的?他们被派往哪里?“京城见军”以外的军队又是谁控制的?驻扎何处?所有这些疑

问,在《魏书》中都得不到答案,似也无人给出合理的解释。个人阅读此节,总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:此时“太上皇帝”正按惯例率军“巡幸阴山”,而隐忍已久的冯氏利用其掌控的部队发动政变,“京城见军”紧急行动的目标是在阴山一带活动的“太上皇帝”拓跋弘。此年六月甲子为初六日,辛未为十三日,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”(《南齐书》卷 57《魏虏传》),鲜卑骑兵为主的部队,六七日间一个来回当不是问题。戒严与军队的突然行动,应该都与献文帝死亡有直接的关系,至于最后是毒杀还是其他方法,无关紧要。历史记录缺失或语焉不详,有时需要合理的推测与想象,好在此文并非正经八百的史学论文,且借此机会放纵一把。

“太上皇帝”死去,皇太后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,“临朝称制”。从此直至其于太和十四年去世,十四五年间,冯氏牢牢地控制着朝政,改革时代终于来临。

冯氏更喜欢中原文化,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感,她“粗学书计”,并非天生的改革者,但她长期以“女主”执政,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,使改革既有必要,也有可能。

北魏此前数代鲜卑族皇帝,喜好马背上的生活,不断率领军队四处征讨,劫掠财物,牲畜与人口,赏赐、宽路随驾征讨的军士与臣僚,若非特殊原因,每年都要率领军队“巡幸阴山”,实际上是到草原上劫掠、狩猎一番。即使是重视中原、颇有“君人之度”的文成帝,也以弯弧发矢、射高及远而闻名,群臣树碑称颂其神勇,残碑至今犹存。鲜卑武人及附属拓跋鲜卑的部落酋长,是统治阶层的核心,对中原的管理,主要依靠武力威慑。

冯氏执政,任用汉族文士的同时,信任身边的宦官及一批被称为“恩倖”的私宠。宦官、恩倖得封王、侯,充任朝廷各部门主官,担任地方大员。当然,冯氏对这些人也能严加管束,他们也能忠实地执行冯氏的政策法令。冯氏的一些私宠,甚至是孝文朝改革的中流砥柱,如孝文朝改革所依仗的重臣李冲。这打破了鲜卑贵族独享政权的局面,为冯氏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。

作为汉族女性,冯氏以官廷作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。太和五年(481)春,冯氏携孝文帝巡视河北,这是她唯一一次远离京城。行进途中,僧人法秀在京城谋反,不少官员牵

涉其中,结果巡视活动匆匆结束。冯氏执政后,皇帝率众劫掠、赏赐这种草原首领维系部众效忠的统治方式,难以继续维持。仿照秦汉以来中原政权的传统作法,按时、定额给官员发放俸禄,势在必然。

俸禄从来都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各政权最为主要的财政开支,要推行俸禄制度,就必须有稳定的财政收入。冯氏当政时,北魏的地方管理体制虽不断成熟,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。不少地方只能通过镇、戍,维持军事性控制,即便设置州、郡、县的地区,基层行政组织阙如,不少民户依附于豪强大族,官府允许豪强管理受其庇护的百姓,代收代缴租税,实质上是北魏统治者所熟悉的草原部落统辖方式在中原地区翻版。在冯氏执政后的新的政治形势下,全面实行州、郡、县行政,健全基层行政组织,实现官府对民户的掌控,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,便提出了议事日程。冯氏发起的改革活动,与其说是北魏前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,不如说是冯氏执政后北魏政治形势变化使然。

冯氏第二次执政不久,便开始营造改革的气氛。“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,乃作《功戒歌》三百余篇,又作《皇诰》十八篇,文多不载。”(《魏书·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》)《功戒歌》《皇诰》,是冯氏代孝文帝行使皇帝权力所颁布的文告,并非全是冯氏亲自撰写。这两个文件,因文字较多,《魏书》未加采录,今已不存,但通过《魏书》中相关记载的综合分析,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:《功戒歌》是以浅显易懂的诗歌形式,主要向鲜卑族官员灌输中原文化精神,并告诫成曲调演唱,在太和五年即已颁布给群臣;《皇诰》则是以更典雅的文体,阐述变革制度的主张,早在太和二年就基本成形。汉族官员高允、高闾、李冲等人都曾参与《皇诰》的制订,原本叫“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”,太和九年(485)正月,以孝文帝的名义在朝堂之上郑重地颁发给群臣,于是称作《皇诰》。《皇诰》正式颁布前后,各项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推出。

太和八年(484),颁布俸禄制,官员按季领取任职报酬;次年,颁布均田法令,确认耕地的所有权,限制私有耕地的买卖,规范开荒土地的使用与占有;太和十年二月,开始在各地设党、里、邻三长,民户五户置一邻长,五邻置一里

(下转 10 版) ➡